

古籍修复与装裱

陈宁著

古籍修复与装裱

嘉福題



陈宁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文元

书函设计：沈钰浩

版式设计：王一之

责任校对：王 莉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片拍摄：陈 宁

修复操作：陈 宁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古籍修复与装裱 / 陈宁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14-1831-7

I. ①古… II. ①陈… III. ①古籍—修复 IV. ①G2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7706号

古籍修复与装裱

陈 宁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6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831-7

定价：258.00元

序一

桐花万里丹山路

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文化赖以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彪炳千秋，与古籍的保存、流传在很大程度上相为表里。古籍的保存常遭不幸，隋朝牛弘曾慨叹于“五厄”，明朝胡应麟同样为之扼腕，并增为“十厄”。兵燹人祸之外，自然损坏也使得古籍极其脆弱，不易存续，因而弥足珍贵。

从博物馆、图书馆的角度看，古籍具有文献和文物双重属性。如何克服古籍的脆弱性，尽可能地延长其物理寿命，是文物保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上海博物馆一直肩负着这样的工作使命，几代人为此不懈努力，兢兢业业，并且非常出色，达到很高的造诣。他们的工作，让古籍延年益寿，方便读者，造福人类，同时也使得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的门类和技艺更加丰富多样。

认识本书作者陈宁两年多了。上海博物馆设有敏求图书馆，内辟一间古籍修复工作室，现时的主人就是她。那天我是为了熟悉情况，一个人在地下二层走走看看，转到修复工作室时，陈宁正忙于工作。我发现她脸上的皮肤有点异样，一问，原来是因为过敏，过敏原正是那些漫长岁月中累积在古书中的尘螨。这次交谈时间并不长，但从陈宁的话语中，我听出了她对古籍修复工作的热爱，和她置身于这一行中深深的“感觉”。

后来，在职代会小组交流等场合，又听过陈宁的发言，对她和上海博物馆古籍修复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上海博物馆修复古籍的几位老专家相继退休以后，陈宁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挑大梁的角色。她的师傅既有上海博物馆的，也有来自馆外的，可谓转益多师。因为对古籍修复工作的专注、投入，她在专业上不断进步，取得成绩。曾与敏求图书馆原主任顾音海先生合著出版《古籍善本》（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颁授的“第一届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优胜奖”。眼前这部题为《古籍修复与装裱》的新作，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倾注了她近年来的大量心血，也蕴含了她来自实践的许多感受和识见。相信本书的问世，将增进人们对古籍修复、装裱这一传统技艺的认识，也有助于古籍修复、装裱专业人员的技能交流和经验总结。

上海博物馆正面临人才队伍的新老交替。我期盼新一代更快、更好地成长，“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序二

文献典籍聚散无常，经过兵燹盗贼之乱、水火蠹鱼之害，流传至今者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外来破坏与自然损耗，部分古籍破损严重，亟待修复。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古籍的整理和保护是各大文献收藏机构的历史使命。保存现有古籍，修复破损古籍，整理出版或数字化珍贵古籍，方能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传承文化记忆。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古籍保护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社会大众关注与收藏古籍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古籍修复与装裱》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本书作者陈宁，淡泊自守，笃学深思，曾经跟从我学习古籍修复技艺。她供职于上海博物馆，参与了大量的古籍修复工作，具有丰富的古籍修复实践经验。她将口耳相传、停留在手头的技艺化成纸上文字，撰写成书，为当代古籍保护事业贡献了一份扎实的成果。在读过本书的初稿之后，我认为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是图文并茂。本书在梳理了古籍保护发展史之后，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破损古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量身定制一套修复方案，在修复技艺的关节点上皆有文字说明，并配以第一手图片资料，给读者最直观的感受。一册破损严重的古书，经过修复师的整治之后完好如初，延续寿命。书中大量古籍修复前后的对比图片，不由得让人佩服作者妙手回春的技艺。

其二是视野开阔。古籍保护工作分为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函套作为古籍的装具，其制作材料与外观形制上的变化，关涉藏书文化在时代与地域两个坐标上的差异。因此，函套的修复是古籍原生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碑帖拓片是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亮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取之与古籍相互参证，时有裨益。以往的古籍修复著作对函套与碑帖拓片的修复措意甚少，作者将它们纳入本书，独立成章，内容翔实，体现了她通达宏远的学术眼光。

其三是专业性强。本书针对古籍虫蛀、鼠咬、粘连、糟毁等现象，详细介绍了相应的修复方法。以函套的修复为例，本书细化到骨扞带、书别子、函盖板等部位，处处体现了作者对古籍修复工作的缜密思考。碑帖拓片的修复案例中，内容涵盖了多种装帧形式、破损情况，具有高度的专业性。

书香隽永，文脉绵长，中华古籍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不仅要有娴熟的古籍修复技艺，还需具备深厚的版本目录学功底，将古籍修复与文本校勘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新技术解决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衷心希望像陈宁这样的青年才俊能够再接再厉，多出成果，继续推进中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读者对古籍本身以及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

古籍修复装裱专家 童芷珍

丙申元宵

古籍善本
細修
合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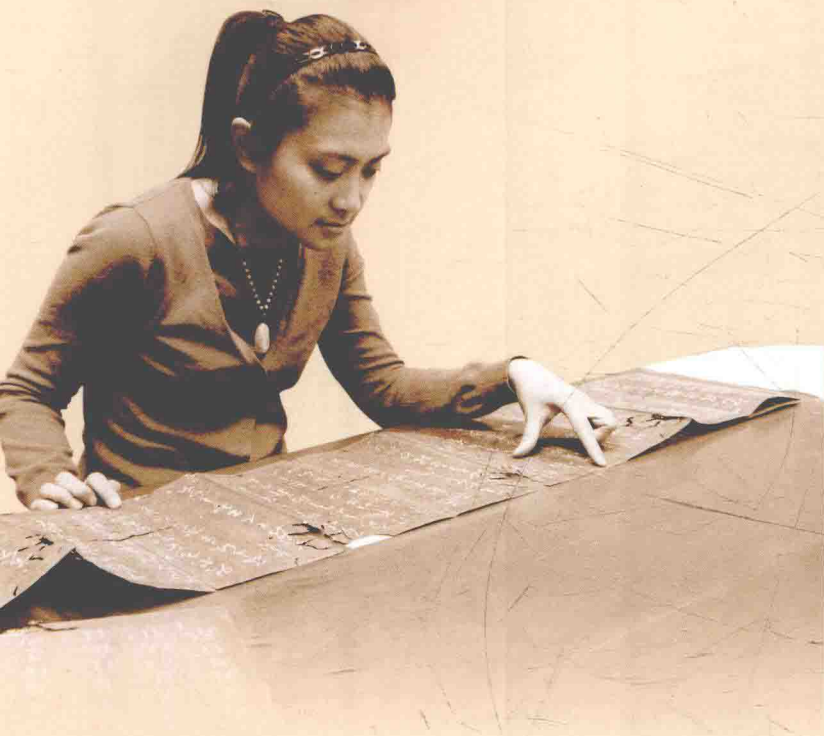
魏碑晉帖
精裝
潢

海上

嘉福書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嘉福先生为本书题联：“古籍善本細修复，魏碑晉帖精裝潢。”



陈宁 上海博物馆修复师。师从沪上名家，长期从事古籍文献修复装裱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2011年获得第一届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优胜奖（第一名）的成绩。著有《古籍善本》（上海文化出版社）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中国古代对书籍的基本保护

- 第一节 皇家藏书、寺院藏书和民间藏书····· 2
- 第二节 古代对书籍的保护方式····· 6
- 第三节 中国书籍装帧与护书用品的发展与变化····· 10
- 第四节 奢华的书籍外衣——函套的基本用色及用材····· 16

第二章 古籍与函套的修复

- 第一节 古籍与函套的损坏原因····· 34
- 第二节 古籍与函套常见的破损情况及修复要求····· 39
- 第三节 常用修复工具····· 41
- 第四节 纸的选择和现代古法造纸····· 45
- 第五节 修复用纸、丝线与函套别子的染制····· 49
- 第六节 糨糊的制作、保存和使用····· 54

第三章 古籍修复案例

- 第一节 虫蛀现象的修复····· 58
- 第二节 鼠咬现象的修复····· 68
- 第三节 粘连现象的修复····· 77
- 第四节 糟毁现象的修复····· 87
- 第五节 书砖的修复····· 100

第四章 函套修复案例

第一节	夹板的修复·····	118
第二节	函套书签破损情况的修复·····	122
第三节	函套上发霉小洞的修复·····	127
第四节	函套缺失骨扞带与别子的修复·····	131
第五节	函套骨扞带损坏的修复·····	138
第六节	函盖处损坏的修复·····	145
第七节	函套中比较大的洞的修复·····	150
第八节	支离破碎的函套的修复·····	157
第九节	缺失函套板的修复·····	170
第十节	六合套的修复·····	181

第五章 碑与帖的修复案例

第一节	浅说碑、帖与拓片·····	188
第二节	经折装拓本虫蛀现象的修复·····	191
第三节	册页式拓本虫蛀现象的修复·····	201
第四节	册页式拓本老化现象的修复·····	227
第五节	整幅拓片粘连及磨损现象的修复·····	234

主要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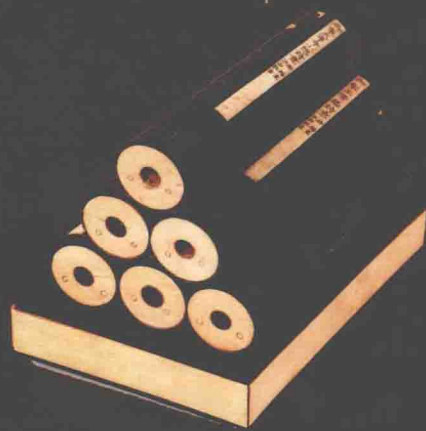
后记

第

一

章

中国古代对书籍的基本保护



第一节

皇家藏书、寺院藏书和民间藏书

皇家藏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置图书收藏机构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国家之一，仅以国家图书馆而言，早在周秦就有“金匱玉室”之称，汉代有石渠、兰台之别，唐宋有三馆、秘阁之分。皇家收藏中，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书籍的聚集、整理在皇权下进行，承载着文化传统，象征着王朝的正统地位，更蕴含着国家的历史与民族情感。

《周礼》中就有官府藏书的记载。《尚书·周书》“多士”篇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其中的“册”与“典”就是指书籍。殷商和周王朝前期，还是“学在官府”的时代，中央天子和王国诸侯的周围有史官，他们负责记言记行，保管文献档案等。因此，当时藏书、读书，乃至编书、著书的权力都只属于这些史官及其所服务的统治阶级。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发掘出一座西周早期大型宗庙基址，并在宗庙西厢房“H11”和“H31”号窑穴内先后出土两批分层摆放的甲骨，共有先周卜甲、卜骨一万七千多片，清理出刻辞甲骨两百多片，凤雏西周宗庙是因殷

礼、行殷制而建的，这一发掘成果确证了三代宗庙内有专门收藏文献的地方。

对古籍做系统、广泛的收集，直到汉武帝时方才开始。西汉经过百余年内修政治、外张武功、积累经济的“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倡导儒家文化，人才辈出。因为儒家文化的学术基于古代经典，儒家学者经过太学考试而入仕政府，古籍再次复兴。《汉书》说，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编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司马迁在撰写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过程中，曾经苦心孤诣地“细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太史公自序”）。“细”为缀集之义，而“石室金匱”则是皇家内廷藏书处的代称。

先秦两汉时期的墓葬，把书籍放在具有保护作用的盒子里随葬的做法屡见不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又称“楚缙书”）被发现时，就放在竹筭之中（实物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东椁，出土大量帛书，式样有两种，一种高48厘米左右，一种高24厘米左右，出土时，整幅卷在两厘米宽的竹木条上，放在一个长方形双层黑色漆奁内。奁的上层放丝带和一束丝织品；下层分五格，靠边一狭长格内底部放置帛书《导引图》《春秋事语》



图 1-1 长方形双层黑色漆奁。夹红胎，光素无纹饰，盖为盂形顶，上层放置丝带和一束丝织品；下层分五格，分别放置帛书等。奁长 59 厘米、宽 37.5 厘米、高 21 厘米

《老子》甲本等，三个较宽的长方形格内放置折叠成长方形的帛书和驻军图等。(图1-1)

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大分裂、大动荡，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这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隋朝继承北周官藏，又颁布求书令，接收陈朝官藏，初步汇集了全国的图书。史载当时“观文殿前为书屋十四间，窗户、床褥、橱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橱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从这段文字可见隋观文殿之壮观。隋王朝仅仅维持了三十八年，却为大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太宗时期，“贞观之治”不但体现在政治、经济上，也体现在文化上。根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儒学上”记载：“太宗为太子时，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待他继位后，继续经营官

藏，收购天下之书，并采取“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的措施，大规模地缮写书籍，“藏于内府，以官人掌之”。唐玄宗前期，经济、文化繁荣，有“开元盛世”之称。唐玄宗本人也文化素质极高，除研习经学外，音律、历象、书法皆通晓，唐代官藏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次高峰。天宝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序所言：“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

宋初的国家藏书主要是在接收五代之遗产中建立起来的。宋太宗继位后，又把重点转向民间。宋人程俱对宋初民间收书做了一番总结，“先是遣使于诸道，访募古书、奇画及先贤墨迹。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又募得者数倍……图书之盛，近代无比”。

大本堂是明初宫廷藏书处之一。《明史·职官志》载：“洪武初，置大本堂，充古今图书其中，召四方名儒辅导太子、亲王。诸儒专经面授，分番夜直。”

作为明清两代专门的藏书机构，文渊阁建于明永乐年间造北京宫殿之时（明初洪武时期文渊阁在南京），在文华殿前，明清之际毁于大火。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于文华殿后废地复建文渊阁，坐北面南，规模模仿宁波范氏天一阁，依四部门目列架分储《四库全书》。

清代皇家藏书处还有内阁大库、国史馆、武英殿等。

宫廷藏书主要是为了皇帝阅览的方便。一般情况是皇帝提出要看一些书，让主管图书的典籍官提取。历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具体的事例。明人黄佐《翰林记》载：“宣德七年七月，宣宗燕闲阅内库书画，得元赵孟頫所绘《幽风图》，因赋长诗一章……九月十二日……曰：朕在宫中，虽寒暑不废书册。”清代不少皇帝好读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壬申，谕侍读学士喇沙里曰：‘朕在宫中博观典籍，见宋儒周敦颐《太极图》，义理精奥’”。“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辛丑，谕太医院官：‘朕研究经史之余，披阅诸子百家，至《黄帝内经》诸篇……’”。

寺院藏书

中国的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寺院的产生和存在是以讲经弘法为其基本活动的，教义、经书则是基本工具，因此，撰写、收集、储藏、传播经书必不可少。佛、道两教都有自己的大藏，即各自经典的结晶。随着经本的增加，佛、道两教对自身拥有的经本不断进行整治、汇集，这样的工作一般都在富有藏书的寺观里展开，是以寺观所藏经本为基

础的。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译经制度十分健全。隋炀帝曾经下诏设置翻经馆，罗致译人，从事译经工作。随着佛教的影响日益深入，佛教典籍也越来越多，寺院藏书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形成了以《大藏经》为主的寺院藏书体系，与皇家藏书、民间藏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唐代道教经藏在书写、装函、收藏方面十分完善。《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法具品”详细讲述了道观中应备之经函、经柜、经架、经橱等法具造作使用的规范，并规定“道藏”的收藏方法：“凡造经藏，皆外漆，内装沉檀，或表里纯漆，或内外宝装，或表里彩画，或名木纯素，各在一时，大小多少，并随力办。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并别三间或七间，安三洞四辅，使相区别。门上皆置锁钥，左右画金刚神王。悉须作台安，不得直尔顿地。”

宋人宋白《修相国寺碑》中有“左钟曰楼，右经曰藏”的记录，说的是藏经楼在寺院的右边。明代佛寺的藏书活动是与刻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简称《藏经》，一称《一切经》。官版的《大藏经》常颁行天下名山大刹，佛寺刊《大藏经》亦可至规定地点“请藏”，故明代寺庙藏经十分丰富。清代佛教受到的重视程度无与伦比，历代皇帝信佛，在皇帝的带动下，刊刻佛教经典著作比较流行，如康熙刻藏文《大藏经》，雍正刻汉文《大藏经》（俗称《清龙藏》），成为汉文《大藏经》的标准本。除皇帝颁赐外，寺院也译、抄、刻、印大量经书，加上善男信女的捐刻、捐抄、捐印，使得寺院藏经蔚为大观。著名的寺院藏

书，莫过于大学者阮元设立的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了，可见清代的寺院已经形成了既藏经又藏书的多元格局。

民间藏书

书籍能提高人的品位，陶冶人的情操，得志时它会告诫你戒骄戒躁，失意时它会劝慰你宁静致远。历代文人的私人藏书，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从春秋至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讲学之风盛行，《庄子·天道》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说的是孔子把自己收藏之书转藏到周王室去。可见孔子是有藏书的。《庄子·天下》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意是惠施学术广博，藏书丰富。《墨子》一书中也有“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的记载。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藏书已经非常丰富。《史记·六国年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唐代是诗文勃发的时代，文人骚客备受尊崇。在当时的政策导向和文化氛围中，文人墨客为了高官厚禄，为了成名成家，必然购书藏书以赋诗文，立言传世。如诗人陈子昂《秋园卧病呈晖上人》诗中道：“图书纷满床，山水霭盈室。”王维《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有句云：“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韦应物《燕居即事》诗曰：“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皮日休的《读书》一诗，描述了他藏书及沉迷于书的情景：“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椳。高斋晓开卷，独共圣人语。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案头见蠹鱼，犹胜

凡俦侣。”家资是何物，书籍堆满橱。独坐高楼，迎着朝阳翻开书卷，与圣贤进行心灵对话。虽与圣贤生不同时，但感觉就像熟悉的老朋友。每日案头看见蠹鱼，胜过见到凡世朋友。与皮日休并称“皮陆”的陆龟蒙，《唐才子传》卷八言其“家藏书万卷，无少声色之娱”。陆龟蒙虽然生活贫困，但仍然坚持不懈地聚集图书，买不起书就向别人借来抄。他的书相当一部分都是辗转相借，然后不辞辛苦地抄写而来。在古代有很多文人像他这样手抄笔录大量书籍。如“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尤袤就是一位抄书专家，他还把每天抄书的情况记在日记上。他的朋友李焘曾说：“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抄若干古书。”在他的督促及影响下，“其子弟及诸女皆抄书”，共同为遂九堂（尤袤的藏书楼）的藏书事业做出了贡献。南宋诗人陆游曾作《遂初堂》诗，其中用幽默的口吻写道：“遂初筑堂今几时，年年说归真将归。异书珍刻堆满屋，欠身欲起遭书围。”从诗中可以看出遂初堂藏书之丰。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藏书”中云：“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清代杭州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竭尽全力搜罗、抄补残缺的《四库全书》，使文澜阁“四库”基本补齐并得以留存至今。可见我国历代私人藏书对保存图书典籍做出了巨大贡献。

利用私人藏书著书立说的也代不乏人。如清代大学问家黄宗羲，求书好学贯穿其一生，到了晚年“益好聚书”，当时浙江一带著名的藏书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长期研究古籍，笔耕不辍，终成浙东学派创始人，写出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

第二节 古代对书籍的保护方式

皇家用于藏书的金匱石室，寺庙的藏经楼，以及古代私家藏书楼、藏书室，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书籍集中起来统一放置，统一保护。

皇家藏书的保护措施

为了收藏、保护书籍，古代皇家藏书地向有“金匱石室”之称，其目的为重緘封、慎保存。《明经世文编》中记录，明弘治五年（1492年）五月，内阁大学士丘浚上书弘治皇帝，提出了保存档案的四条建议，其中说：“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匱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斫石以为室，铜金以为匱，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远传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丘浚的建议后来成为建造皇史宬的张本。皇史宬規制宏大，全部为砖石结构，可以防火，坚固耐用；厚厚的墙壁使殿内冬暖夏凉，保持适当的温度与湿度；辟有东、西窗，可使空气流通，避免潮气；高台可以泄水并避免地下湿气的侵蚀；铜皮樟木柜，可以防虫防尘。作为明代宫廷藏书的重要处所，皇史宬所藏《宝训》《实录》等书籍一直保留至清代。

宫殿藏书的维护则更加系统。为了妥善保

管好图书，宋代设有专门机构管理、保藏图书，如宋太宗就明确表明馆阁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的官署，因此，时人把能够进入馆阁，担任清切贵重的官职称为“登瀛成仙”。正如欧阳修所说：“自祖宗以来，所有两府大臣多矣，其中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

宫殿藏书有严谨的管理制度。清代朝廷组织儒臣对各种古籍进行整理考订，修补装潢，并定期责令专人检查、抖晒、除尘、防蛀。至于借阅，也有规定，“阁中书籍……若概许开函（函为书籍的保护用品）翻阅，不无黻损……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有愿持笔札就署抄录者，亦听之”。可见当时书的借阅还有人员上的限制。

清康熙帝常命内廷翰林对古籍加以考校、抄配、装潢及配做套签、书匣等，并以白签记录下来附在书内。此后清诸帝大多继承了这一传统。清代晚期，虽政治、经济衰退，但宫内藏书的维护还在不间断地进行。根据仅有的档案初步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修书处为装潢宫中藏书呈报各项开支，采买各色锦、丝、黄龙绫、杉木板、紫檀木匣盖等十七项，共计白银145317.48两。尽管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足以证明朝廷对藏书的重视。

寺院藏书保护措施

我国的寺院藏书都设有专门的藏经楼，各寺院设立经藏已成定制，或阁，或堂，或院，或楼，“经藏”一词已成为藏书处的专称。寺院经藏之管理已有章法，经本的抄写、分类、排架、借阅等一般都有严格的制度。

把经书集中起来放置，有利于图书的统一管理与保护。唐代道教经藏在藏书管理、书写、装函、收藏方面也很完善。《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就有关于经书的装帧、储存、排架规定：“科曰：凡帙有五种：一者锦绮，二者织成，三者绣作，四者纯彩，五者画绘。皆内安里及带如法。皆书题曰某经。科曰：经函凡有十二种：一者雕玉，二者纯金，三者纯银，四者金镂，五者银镂，六者纯漆，七者木画，八者彩画，九者金饰，十者宝装，十一者石作，十二者铁作。大小任意。科曰：凡经橱有六种：一者宝装，二者香饰，三者金银隐起，四者纯银，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在时。凡经架有十种：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银作，四者沉木，五者紫檀，六者白檀，七者黄檀，八者名木，九者纯漆，十者金银隐起。”以上不仅表明道教宫观经藏在藏书上的严密细致，而且体现了经藏装帧、储存、排架的丰富多彩和对经籍保护的不遗余力。

隋唐时期，有的寺庙为了保护佛经，还采用秘藏方式。一种是在深山洞窟里凿刻石经。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的石经，历经千余年，累刻一万五千多片，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石刻《大藏经》和篇幅最长的文字石头书。第二种就是将经书藏于佛阁密室内，例如著名的敦煌石窟。这和金匮石室的作用异曲同工。除了专门的在石头上刻经、把经放入石室，还有专门的石函藏经。如《宋史》卷四五五“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忠义·徐道明传”中记录：“徐道明，常州天庆观道士也。为管辖，赐紫。德祐元年，北兵围

城，道明谒郡守姚岏请曰：‘事急矣，君侯计将安出？’岏曰：‘内无食，外无援，死守而已。’道明亟还，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与城俱亡，吾属亦不失为义士。’乃取观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炷香，读《老子》书。兵使之拜，不顾，诵声琅然；以刃胁之，不为动，遂死焉。”说的是宋代天庆观道士徐道明，在德祐元年（1275年）北兵围城时，把观中的书籍藏于石函又隐放在坎中，并危坐其上。当士兵以刀威逼他离开时，他毫无惧色，最后为护道书而死。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有石头做的函套作为护书用品。

私人藏书的保护措施

中国古代诸多藏书家往往同时也是大学问家，他们爱书、藏书，对书的装帧与保护不遗余力。私人藏书有放入石室保存的记载：宋末元初，胡三省撰《资治通鉴广注》，书稿九十七卷，在战乱中丢失，后他发愤而作《资治通鉴音注》，稿成藏于袁桷家东轩石室，才得以保全。

宋代藏书楼的兴建，流传下许多爱书、护书的佳话。如藏书伉俪赵明诚与李清照在归来堂上论金石。李清照所著《〈金石录〉后序》中提到：“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坏，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说的是藏书既丰，遂打造书库大橱，将书目登记造册，按目录安置，要看的话需取钥匙登记后领取。看完书后书页或稍被污损，要擦拭干净方复归橱。文中提到的保护方式是把卷帙（帙，装卷轴装书籍的布袋）放在大橱里，每次读完，弄脏的地方要擦拭干净。这是对书籍防尘、防污方式的记录。留存至今的私人藏书楼，如著名的明代藏书楼天一阁，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了。建筑原理就是取



图1-2 各色书柜。对开门，有门杆，门杆上备锁鼻和拉环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为了防止书楼失火，在书楼前挖池塘，以防“远水救不了近火”之虞。

南方地区潮湿，每逢梅雨季节，往往阴沉多雨，故人们给梅雨起了别名叫“霉雨”。明代谢肇淛（字在杭）在其笔记《五杂俎·天部一》中记叙：“江南每岁三四月，苦霖雨不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雨。”梅雨季节，其相对湿度在八十以上，霉变指数在二至三级，故防治书籍的霉湿变质为第一要务。天一阁藏书楼为两层一通厅，为了防潮，用书橱隔开，其中多窗户，使空气流通。天一阁的书柜内还放置石英以防潮收湿。自范钦开始，范氏子孙每年梅雨季节之后至中伏期间，值班者邀齐各房房长，启锁进入，翻晒图书。

民间藏书楼、藏书阁都设有书柜。古代一般的读书人家，虽然藏书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也会在家中设立几个书柜。（图1-2）除了书柜，古代书房还有架格用以放书。架格是简化的立柜，它不用门和侧板，仅在四立柱间取横板将空间分隔成若干层，以放置书籍，故也称之“书架”或“书格”。（图1-3）有诗为证。韦应物《燕居即事》诗云：“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李廓《上令孤舍人》诗曰：“买书添架上，断酒过花时。”这些诗句都表明他们家中不但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而且书都放在特定的书柜、书架上。

白居易《题文集柜》诗曰：“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由此诗可知，白居易用柏木造文集柜，收藏了他一生的诗作，这是他的诗得以留传后世之明举。

文人爱书，会在家中选择干燥的房间用于藏书，书柜中也会添加些药物以助护书。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中记：“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